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探索者的声音

四川人民出版社

612501



编辑出版说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批既懂理论，又懂实践，既有战略思想，又有求实精神的骨干队伍，已经愈来愈成为时代的需要。

为此，经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和一些理论研究部门，实际工作部门和宣传部门共同商量，决定从1986年10月开始，连续举办“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

举办讲座的目的是力图通过这种形式，为中央各部门及地方政府中从事体制改革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的同志及时介绍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研究情况，并给大家创造一些对话、交流和研讨问题的机会。

讲座的内容包括：经济环境、改革形势、经济结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计划、外贸外汇、劳动工资、企业、农村经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社会公平与保障、改革的社会心理反映、改革宣传、理论方法等，每期讲座一般以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重点问题为主要内容。

为了使更多的同志了解讲座的内容，我们适当地把这些讲稿整理选编，汇集成册，供同志们在工作和研究中参考。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1987年6月

附：参加联合讲座的单位

1.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
2. 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
3. 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4.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
5.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6. 国家经委经济管理研究所
7. 国家经委青年经济研究小组
8. 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9.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1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11.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
12. 城乡部基本建设经济研究所
13. 对外经贸部体改办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6.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
17.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
18. 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

19.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20. 中央党校理论部
21. 团中央研究室
22. 北京市体改委
23. 经济日报理论部、经济工程部
24. 中国青年报社
25. 中国青年杂志社
26. 世界经济导报社
27.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28. 中青年经济论坛编委会

目 录

改革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小强 (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厉以宁 (11)
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与现状·····	朱嘉明 (22)
坚持经济体制改革, 实现经济有效益的稳定 发展·····	何家成 (37)
短缺、软预算约束与经济体制改革 ——科尔内经济思想的精华·····	李振宁 (47)
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经济环境·····	李剑阁 (6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双重体制问题·····	赵人伟 (74)
当前的货币政策与金融体制改革·····	吴晓灵 (80)
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发展·····	夏斌 (91)
基层银行行为和金融体制改革·····	赵榆江 (100)
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贾康 (113)
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改革·····	马凯 (124)

关于我国价格改革的若干问题·····	田 源 (135)
汇率与外贸体制改革·····	黄江南 (151)
企业行为调整与企业制度改革·····	张少杰 (160)
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	徐景安 (170)
资产经营责任制：从理论假说到改革实践·····	张学军 (184)
现代股份经济分析·····	刁新申 (200)
紧缩中的经济增长	
——1986年上半年微观景气分析·····	王志刚 (213)
投资机制与投资改革·····	赵 明 (226)
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	杜 鹰 (239)
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面临的转折·····	吴仁洪 (254)
我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	杨 沐 (272)
结构性矛盾和技术传导阻滞·····	张阿妹 (283)
乡镇企业现状分析·····	邱继成 (301)
企业联合与公司企业化·····	尹蓝天 (313)
关于制定和实行企业破产法的若干问题·····	曹思源 (324)
农产品流通体制与市场组织·····	卢 迈 (332)
我国的粮食问题·····	高小蒙 (344)
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的发展·····	陈锡文 (354)
中国的城市化(提纲)·····	白南生 (372)
西部理论基础·····	郭凡生 (384)
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杨冠三 (394)
劳动工资、就业与社会保障·····	董克用 (410)
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及改革意识的传播·····	白南风 (421)
编 后·····	(439)



改革中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王小强

“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第2期今天开始了。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代表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困惑的几个问题，希望和大家一起来研究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与创造企业自负盈亏的条件。

旧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效率，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没有积极性，经营者和生产者没有积极性。农村的改革从逻辑上说也很简单，就是把经济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结合起来，于是就焕发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农村的局面就有了根本的改观，即经济有了活力。城市改革受到农村改革的启发，1979年、1980年农村改革之后，我们曾经提出“包”字进城口号，这个口号从经济逻辑角度讲是对的。1982年初，北京开始实行“包”字进城的

试验。结果,群众反映最强烈,也是任何思想工作都难以根本解决的服务态度问题得到了解决。所有承包的商业企业,其服务态度都为之一变,而且是根本性的变化。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包”字,就解决了。实践证明,“包”字进城,把经济利益与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基本原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正是在运用“包”字进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是严重的苦乐不均。卖自行车的态度并没有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劳动强度也没大多少,奖金多得就没法发了,几个柜台承包后的奖金没法兑现,而卖菜的为了增加附加价值。把白菜剁成馅卖,最后连基本工资都不够。“包”字进城的试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城市改革不同于农村改革之点,并不在于经济逻辑不同,而在于城市经济生活不象农村那么简单。城市改革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必须为企业创造起码的平等竞争的环境。这一点通过这几年体制改革的实践,人们已经体会很深了。以后的改革,如利改税的改革、价格的改革,计划调拨体制的改革,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都是围绕着为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来考虑问题的。但是能不能在企业真正实现自负盈亏之前,创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这个问题实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可以说当时改革政策有两个并行的出发点:为了实现企业的自负盈亏,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与此同时,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也在进行,如留利制度的实行,奖金制度的实行,大包干等。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为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环境,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才能真正实现。这是通过1982年“包”字进城的实验后得出的结论。但是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种思想:要是企业自负盈亏不能实现,平等竞争的环境就无法创造出来。这两种观点的争论,集中表现在价格改革的方案上。在匈牙利

利价格改革过程里，科尔内发现“比价复归”的现象。他们改革所面临的状况与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企业也没有平等竞争的环境。价格是加工工业价格偏高，生产资料价格偏低，加工工业税赋过重，生产资料价格给予一定的补贴，与我们的财政体系在大的方面也是一致的。为了改变这种格局，为了给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他们曾经设计了价格、财政、税收联动的改革方案，也多次提高生产资料价格。经过实践发现，由于企业没有自负盈亏，即企业在改革中处于只负盈不负亏的状况，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加工工业成本增加，实际上被加工工业转化在产品价格上。他们20年的改革中，有三、四次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每提高一次生产资料的价格，而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上涨一次。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最终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直接威胁到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时，用不着国家来调节宏观的收入政策，厂长就顶不住职工发工资的压力，于是通过留利、奖金，职工收入也随之增加。经过这一轮改革之后，发现生产资料价格比价偏低的情况依然存在，区别只是价格总水平提高了。所以科尔内称此为“比价复归”，即不合理的比价经过这一轮的改革之后，又还原了，企业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竞争的环境。1986年5月我们组成了18人的考察团，在匈牙利、南斯拉夫分别考察了50个企业。50个企业对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几乎100%地转嫁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上，没有一个消化价格上涨的企业，全部顺手推出去。这个现实告诉人们另外一个结论，如果企业不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那么创造企业平等竞争的环境可能就是一句空话。这一点在我国这几年生产资料价格部分上涨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所以两个逻辑都是真的。第一个叫做要想实现企业自负盈亏，就必须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第二个逻辑就是

只要企业不能实现真正的自负盈亏，就无法为企业创造出平等竞争的环境。这是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如何把握这个悖论，我们觉得是改革中大的政策出发点上的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表现为很多个方面。这里只能举个例子。比如：投资体制的改革。传统体制是企业的利润全部上缴，再生产的任务完全由国家负责，于是造成投资效益好坏没有人负责的局面。投资体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是传统体制改革的根本。今天我们搞的各种责任制，之所以在有些政策约束上出现边界不清，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决策分开而结果则又是混在一起的。西方的投资风险是通过购买或抛出股票来承担的。经营的责任是厂长、经理的，经营的风险和收益由经理负担。现在三线的许多工厂，是由于投资不正确造成的亏损，还是由厂长无能造成的亏损，很多情况下说不清楚。有时明明这个行业已成“夕阳工业”了，但上级投资建厂，这时就是派去一个再能干的厂长也赚不了钱。有时由于投资正确，即使厂长经营水平很一般，由于市场行情好，照样能赚大钱。这时，盈利中相当一部分收益实际上是由于投资正确带来的，应归于投资者，与经营没有直接关系，而现在这成绩通过责任制，却只能算在厂长身上。所以在投资的风险、收益与经营的风险、收益混为一谈时，对厂长的约束就很难弄清楚。中国的现实是投资失误没人负责，投资收益了也没人受益。对于投资决策者而言，既然投资正确，我不能受益，投资失误又凭什么让我负

责呢？在西方纯粹商品经济体制下，这两种职能是由两种不同的主体承担的，界限是相对清楚的。我国目前投资是由国家决定的，然后就不得不把投资的风险和收益以及经营的风险和收益一股脑儿统统溶进厂长责任制这一个内容中去。这从道理上说不通，约束当然也就“硬”不起来。所以，投资体制不改革，可以说通过旧体制每投资一个新产业或新企业，就创造了一个科尔内所说的“软约束”的新企业，创造了一个旧体制生命的延续。只要投资的责任、风险不明确，那么对厂长的约束就是软的。投资决策的失误和投资正确带来的损失或收益与经营决策失误和经营决策正确带来的损失或收益搅在一起，无法准确地判断和约束厂长、经理的行为。我们觉得企业要想真正的自负盈亏，投资体制必须有个根本性的变化。从一般的经济规律讲，投资职能下放给企业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投资的主体还可以再讨论，究竟是股东形式，还是抽象的企业投资，但至少由行政部门既不得到投资正确的收益，也不承担投资失误的损失的投资体制是肯定不行的。把投资权下放给企业肯定是正确的方向。但在下放的过程中，出现了投资规模小型化的趋势。由于我们没有资本市场，过去国家的钱是从分散的企业中集中起来，集中投资。现在，企业通过减税让利，使原有资金的所有权分散化了，在没有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每一个企业拥有的钱是有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散化必然造成单位投资规模小型化。1985年我们到四川省做了一个调查，平均全省当年的投资规模只有19万，大项目越来越少，并且基本是由财政集中的资金来投资的，企业的投资基本都是小项目，有的连一台一般的机床都买不起。在我们调查的400个企业中，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基金，平均一年50万元左右，小企业10万元都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资金的横向融通，导致

的结果必然是投资规模小型化。与小型化相联系的是轻型化。基础工业部门一般来说，投资的资金规模、技术规模都要求比较高，需要调动的资源、要素、资金都比较多。不管其愿意与否，且不说加工工业资金回收快，盈利高，就算是有了平等竞争的条件，有了平均利润率实现的条件，由于投资规模本身大不起来，轻型化的倾向也是难以避免的。“七五”期间，我们大概进行了7000亿的投资。“七五”期间的任务是为1990年以后经济的全面振兴奠定物质基础的，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发展任务。改革的要求是要下放投资权，把投资权还给企业。但如果这个期间，我们的7000亿投资都是小型化、轻型化的投资，那么民族经济的振兴就不可设想。所以，我们觉得在投资总规模扩大的同时，投资简政放权的改革也带来了单位投资小型化和产业结构轻型化的可能，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新问题。1985年和1984年，钢材价格通过双轨制，曾经高到2000多元1吨，这个价格应该说有足够刺激力使冶金业的投资有较大的增长，事实上从一些钢厂的投资看，也确实如此。但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投资的积累相比，这个增长是不理想的。“六五”期间，加工工业投资过旺，基础原材料部门的工业投资相对不足的现象很明显。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小钢厂。从道理上说，小钢厂可以成长、发展，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长成符合经济振兴需要的几千万吨的大钢厂，难以给予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说，在没有资本市场，没有资金横向融通的前提下，简政放权的改革步伐，就要和发展的目标相冲突。经过30年经验的证明，传统的投资机制是不可能为我们的民族经济振兴奠定基础的，所以才提出改革的任务。改革到现在，如果不解决小型化、轻型化的问题，单纯地让利还权同样不会为我们的民族振兴带来一个很好的前景。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觉得在改革过程中

应该很好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宏观改革与微观改革的关系

究竟是从宏观管理手段入手进行改革，还是侧重于微观、企业、市场方面的改革推进，类似于前面第一个问题，也是改革研究中时时发生争论的重要问题。1984年，我国经济全面高涨，同时出现消费基金膨胀，投资规模膨胀。1985年，我们采取了紧缩的政策。在讨论紧缩政策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在同意紧缩的前提下，一种认为有什么手段就使用什么手段；另一种认为不能用老的办法来紧缩，要用一些新的办法，即所谓宏观总量控制，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来压缩投资、消费需求。我所宏观研究室对1985年的紧缩结果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发现现代宏观总量控制至少在现在对中国是不能直接搬用的。现代的总量控制，通俗地说就是经济手段的间接控制，操作起来似乎简便易行。在纯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货币供应量，导致的结果是货币的价格上升，即利率上升，也就是投资成本增加。投资成本增加导致投资萎缩，投资萎缩导致新增就业萎缩，这就把消费需求也压下来了。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经过多次操作证明的简单的规律。但在我国，工人的工资是第一位刚性的，工资不受货币供应左右；第二位刚性的是投资规模。弹性最大的是企业的流动资金。1985年在全面紧缩的情况下，工资性支出不仅绝对量上没有减少，而且从增长速度来看几乎与1984年膨胀时期是一样的，这还是在有惩罚性奖金税实施的同时得到的结果。投资规模可以说几乎是靠行政指令性控制压下来的。结果造成流动资金的高度紧张，直接抑制了供给，使产值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企图为改革创造一个宽

松的环境，从这个目的出发，提出了紧缩。所谓宽松的经济环境，就是价格比较稳定，物资比较充裕。这个环境确实到来了。只是当价格终于出现稳中有降的局面时，生产已经掉得不能让人忍受了。在西方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的简单再生产是刚性的，也就是说紧缩政策一般紧的是新增的投资，新增的就业。这一点在我国乡镇企业中恰恰反应很突出。1985年无锡的乡镇企业紧缩了8000万元的工资，将这8000万元补充到企业的流动资金中去，来维持企业的简单再生产。这是较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如果我们面对的都是这样的企业，那么就能达到变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经济手段间接控制的目的。缩下的部分就是新增的工资和新增的投资。乡镇企业面临资金供应紧张时，采取的反应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而国营企业的反应是亏损了也得照发奖金。1985年我们实行了工资改革，相当一部分的小企业是微利或亏损的，是不够两个半月的。怎么办？财政出钱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企业状况采取不同的宏观政策。目前引进现代的宏观总量控制，可以对乡镇企业、部分集体企业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也恰恰证明，只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变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经济手段间接控制是完全可能的），但却不符合大多数国营企业的实践。

必须肯定，变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经济手段间接控制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紧缩的实践已经表明，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得有微观改革的推进。

第四个问题：企业制度的改革

中国的企业所有制改革，究竟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企业制度既是传统体制的核心，也是新体制的核心；企业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我们在研究中至今尚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问题。1986年年初，匈牙利进行企业改革，实行了几个制度。一个是成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由企业的干部、工人，各出50%的代表选举厂长，同时给企业较大幅度的扩权，折旧100%还给企业，并且取消了三项基金比例使用的办法，由企业自己决定消费多少，积累多少。这个政策实行的结果是，企业管理委员会首先给厂长开工资，然后倒过来，厂长给管理委员会给全体工人开工资。匈财政部调查300个企业，这300个企业都不同程度的甚至动用折旧来发工资。南斯拉夫实行企业自治，几十年来始终受着企业积累不足的困扰。我们去那里考察时，他们20%以上的企业积累率基本上就是零，每年都是吃光花净；每年积累率在20%以上的仅占总数的7%左右。他们的厂长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长工资的压力，在这种制度下厂长是无法抗衡的。我们纳闷，为什么南斯拉夫的同志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是由于政治原因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自治制度是不能碰的。南斯拉夫同志在讨论时也很中肯地说，企业积累不足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困扰，经过40年的实践，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能不认识吗？我们心里很清楚的是取消工人自治，就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恢复。现在他们不得不正在部分地“恢复”。在我们批判最不合理的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的时候，取消了多年工

资控制的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公布对工资的全国统一的管制制度。从经济逻辑角度讲，国家是不应管企业工资的，工资的高低完全应由企业自己来决定。由于今年南斯拉夫通货膨胀率达100%，使国家不得不公布工资统一管理等级。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彻底实行产权私有制，才能解决企业行为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远不象经济逻辑演绎来得那么简单、明快。除了诸多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之外，就经济逻辑本身而言，关键在于必须面对实践，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小企业相对好办，包、租、卖、分，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实践，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宝钢怎么办？鞍山怎么办？中国银行怎么办？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如何办？给哪个人？退一万步，就算是按照西方的经济逻辑推演，也显然不是一个私有制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改革中尚未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是简单照搬西方经济逻辑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也是最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充分发挥想象力，运用我们的智慧在实践中而不是在演绎中着力研究的。

（本文是1986年12月1日在第2期“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联合讲座”上的报告摘要）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 几个理论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 厉以宁

一、关于所有制改革

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把所有制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还是把价格改革作为关键，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下面从十个方面对两种改革思路进行比较。

1. 价格改革产生负的心理效应。就是说，在价格改革时，人们会想到“丢掉什么，失去什么”，从而对价格改革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而所有制改革产生的是正的心理效应，人们会想到“得到什么，增加什么”，于是有一种配合的态度。

2. 价格改革不能试点，而且有不可逆性，所以有较大风险。所有制改革可以试点，从点到面，逐步推广。改革中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修改、补充。

